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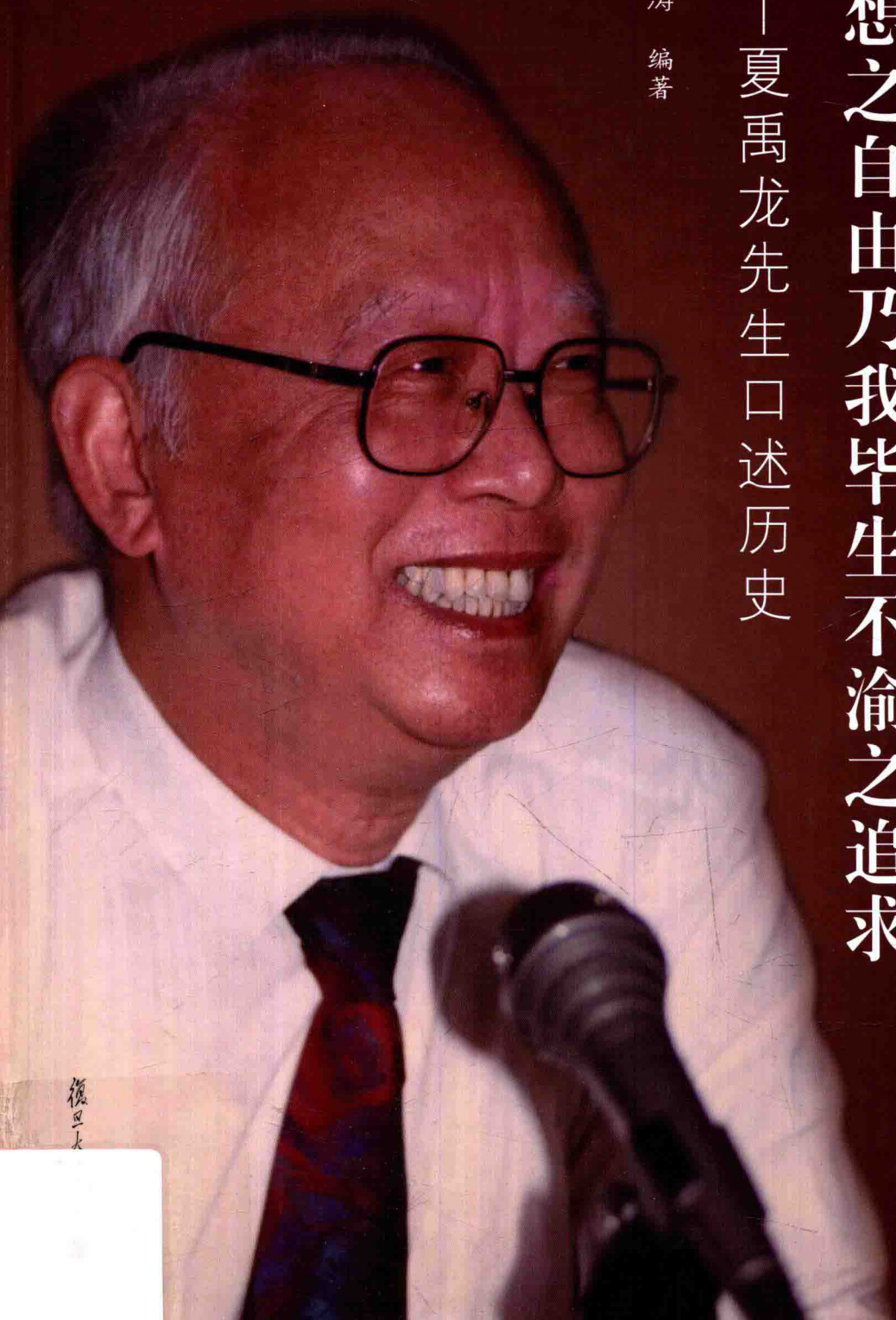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 60 周年口述系列丛书

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

——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

葛涛 编著

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口述系列丛书

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

——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

葛涛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——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/葛涛编著.

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7. 8

(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 60 周年口述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309-13004-1

I. 思… II. 葛… III. 夏禹龙-回忆录 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28889 号

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——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

葛涛 编著

责任编辑/梁玲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8.75 字数 115 千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3004-1/K·614

定价: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作者简介



葛涛，1970年3月生，上海市人。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学士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，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，研究员。主要研究邻域上海史、中国近现代史。主要著作包括：《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9年）、《具像的历史：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1年）、《环球百货光影录：上海先施公司盛衰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1年）、《如日初生，以新制胜：上海大新公司的流金岁月》（广东经济出版社，2014年）等。

内容提要

夏禹龙同志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毕生从事理论研究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，均有突出性贡献，曾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全国最早的邓小平理论中心之一。此外，他还与汪道涵等领导同志熟识，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、上海世博会举办等重大活动的咨询决策工作。夏禹龙同志解放前即于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共地下党，建国后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及著述，饱经沧桑，经历极富传奇色彩，是目前上海宣传系统屈指可数的前辈。本书为夏禹龙同志对其一生的口述回忆记录，糅合了他的人生经历与治学道路，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总结与反思。

前言

我的口述历史，经过半年的反复琢磨，终于完工了。历史是记录已经过去的事实的，首贵真实，个人口述历史也不例外。我立意向这方面努力，但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加之年迈记忆衰退，力不从心，又受认识水平的局限，究竟努力的结果如何，只有待诸多不吝花费时间阅览本书的读者们评说了。

我个人对这本书是有所偏爱的。首先是因为通过对本书内容的口述，使自己有机会对一生的经历作一次较为认真的反思。我生长在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全球化的时代，又身处近现代跌宕多变的中国。面对这样的世情和国情，一个人无论有多么高的聪明才智，都不能自诩为一贯正确、不犯过错的先知，何况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。所以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，提高自知之明，才能不忘初心，有所前进。口述史、回忆录最易出现的问题，就是有意无意地美化自己。我对此有所警惕，尽量地把当时当地自己真实的原始思想表述出来，但毕竟记忆是会有选择的，实际能做到怎样的程度还很难说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，是要与人为善。历史总是通过人际交往呈现出来的，有对自己有帮助的，也有与自己有某种过

节的，都应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。要特别警惕为了褒己而贬人，这是违反与人为善的准则的，我在自述中尽量注意避免。

历史是丰富多彩、多层次、多侧面的。现有的通史、断代史，且不说修史者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，会对事实有所歪曲，就是比较公正的，也是偏于宏大叙事，对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鲜活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反映较少，显得过于抽象，这是一般正史难以避免的缺陷。诸多野史和回忆录、口述史，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，希望我的这本小小的口述史，也许可以列入其中万一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葛涛先生。没有研究所的创意和安排，没有葛涛先生不辞辛劳，反复记录、整理、查证和修正，这本口述史是难以问世的。

我年事已高，精力不济，但是理解力尚可。在运用电脑、网络等新事物方面，大大落后，和第三代共同语言很少。但是自己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，对后人也是一种财富。现在的年轻人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知之甚少，我们否定了它，但是还要反思它。这方面要有一个代际沟通，使历史延续下去。

我自己觉得对社会贡献不大，但是政府和社会对离休干部照顾很多。好在人们对离休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，不像对现任官员那样，还比较谅解。我自己觉得对社会应有所回报，尽可能把自己的知识、经验、见解贡献出来。出版这本口述史，也是一例，以表一位耄耋老人对中国发展前途深切关怀之意。

目 录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一、投身火热的学生运动 (1945 年 1 月—1949 年 5 月)	1
--	---

家庭情况和我的童年 / 1
入党和迎接抗战胜利前后 / 3
我的老师赵宪初 / 6
转校、转系——我的动荡的求学生活 / 12
我的第一位领导——吴学谦同志 / 15

二、在新社会中蹒跚曲折前行 (1949 年 5 月—1966 年 5 月)	18
--	----

解放初的青年动员革命工作 / 18
“大鸣大放”的旁观者——逃过一劫 / 19
“大跃进”的“促退派”——“再”劫难逃 / 23
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/ 25
在规律问题上与王若水的商榷 / 31
加强“内控”和参加“四清”——“文革”被揪斗的前奏 / 38

三、经历“文革”折腾，从迷茫中逐渐醒悟

(1966年5月—1976年10月) 41

“三反”分子的加冕 / 41

在“五七”干校的改造 / 42

重当编辑的经历 / 45

四、从“评法批儒”转到揭批“四人帮”

(1976年4月—1979年8月) 47

对古今桥梁的实地考察 / 47

对“四人帮”的集中揭批 / 49

五、形成“四人研写组”，为改革开放鼓与呼

(1979年8月—1990年7月) 51

“四人研写组”形成的过程及其缘由 / 51

领导科学的创立 / 54

四人合作的方法和分工 / 61

六、参与咨询工作，为地区战略和上海发展献策

(1982年3月—2010年10月) 63

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 / 63

世界博览会和浦东新区开发开放 / 68

七、研究邓小平理论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

(1992年9月—) 77

邓小平理论研究 / 77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 / 82

八、难忘长期兼职主编的两本杂志	88
《世界科学》(1928—2005 年) / 88	
《上海理论》内刊(1988—1997 年) / 89	
九、剖析个人治学特点	93
十、铭记对个人成长有重大帮助的 5 位长者	97
周克 / 98	
洪泽 / 99	
汪道涵 / 101	
郭绍虞 / 102	
郑成美 / 106	
十一、不忘家庭作为后盾的支撑作用	108
十二、将思想之自由贯彻到人的生死观中	111
附录	113
附录一 纪念我的高祖夏同善 / 113	
附录二 大事年表 / 121	
附录三 著作目录 / 129	
后记	1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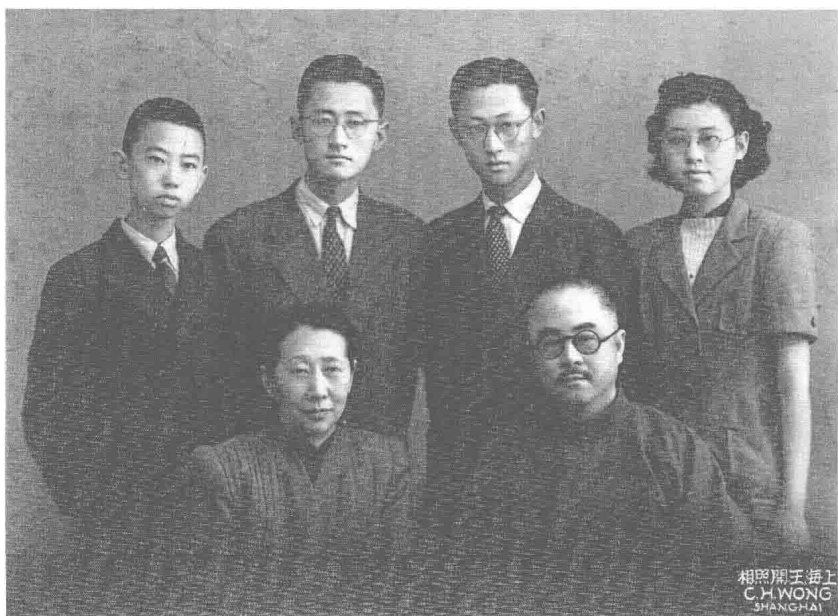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投身火热的学生运动

(1945 年 1 月—1949 年 5 月)

家庭情况和我的童年

在讲述我的历史之前,先来交代一些家庭情况。我的父亲夏邦辅,是大通煤矿的襄理(襄理之上有经理和副经理,是煤矿的第三把手)。大通煤矿在安徽,系淮南煤矿的前身,是一家私营企业,抗战爆发后被日军占领。此前,父亲曾任北洋政府驻美国大使馆的秘书。父亲也持有大通煤矿的部分股份,划起阶级成分来,应属民族资本的资方代理人。母亲朱静之,一直从事家务。长兄夏禹思,要长我 6 岁,约在 1942 年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社副主编。姊夏孟英(林北铭),长我 5 岁,与夏禹思差不多同时入党,曾任世界工人联合会亚澳联络局印度组副组长、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副所长。次兄夏禹闻,长我 3 岁,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入党,在外交部工作,曾任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秘书。兄弟姊妹中,我是最小的。父亲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他为人老实、本分、没有多大能力,由于煤矿被占领,对日本人充满怨恨。我的家境比较富裕,虽然抗战爆发后生活状况有所下降,但家中仍雇有厨师和保姆。

我出生于 1928 年 3 月,小时候家里请家庭教师启蒙。先生除了讲授



●我的全家合影 前排：左一朱静之(母)，左二夏邦辅(父)；后排：左一夏禹龙(我)，左二夏禹思(大哥)，右一夏孟英(姊姊)，右二夏禹闻(二哥)。

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要求背诵之外，还要我写作文、练毛笔字、学对对子等。我10岁时进了学堂——正志小学。由于在入学前我已补习过数学等课程，因此直接进入四年级下学期，读了两年半小学。因为我家念过“私塾”，古文功底比别人强，因此用文言文写起作文来，在学校里属于“第一流”水平。其他功课也好。小学毕业前，一共5个学期我考试都是第一名，几乎没有竞争对手。小学毕业后，我考取了私立南洋模范中学。当时上海有两所中学非常有名，一所就是南洋模范中学，另一所是位于市郊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。抗战爆发后，上海中学迁入租界，改名“沪新中学”。南洋模范中学是一座私立学校，没有什么政治背景，教职员中既没有国民党员，也没有共产党员。学校希望一门心思办学，不受各方面政治因素干扰。校方一方面与汪伪保持距离，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势力进入，三青团与地下党也都不受欢迎。由于进入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都是各小学的尖子，我的优势大为减弱，再也不可能像小学时期那么突出了。我也就“甘居中游”，成绩一直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。

入党和迎接抗战胜利前后

我于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一方面是受到家庭的影响,我的大哥夏禹思、姊姊夏孟英早已是党员。1944年他们加紧对我和二哥的教育。记得有几次在晚上父母都睡觉以后,4个人聚集在姊姊的卧室,席地而坐,盖着棉被,一起讨论时事政治和人生理想等问题,一直到半夜。这也是对我的启蒙教育。另一方面,我看了一些进步书籍,也受到很大影响。我记得当时读过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,觉得共产党在这样艰苦、危险的环境下坚持斗争,真是了不起。我相信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,而国民党的抗日是消极的、敷衍的,因此从抗日这一点上,我就倾向于共产党。除了爱国民族情绪外,我选择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。追求社会公平、人道主义,也是我当时思想中的重要部分。记得当时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后,思想上的震动很大,觉得纱厂里那些年幼的包身工实在太苦了,我强烈地感到应该实现社会公平。而实现民主自由、个性解放,也是我追求的目标。在这方面我受鲁迅的影响最大,当时我几乎读遍他的杂文。我接受了鲁迅“五四”以来激进的反传统思想,也变得反传统,认为中国的封建传统不行,必须去掉。现在看来,这既有进步的一面,也隐含着“左”的一面。例如,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经讲到:中文太难,真正识得中国字的人是极少数;将来要取消方块字,代之以拉丁字母。我对此是赞成的,为此还与同学进行过辩论。

我入党后,在1945年2月南洋模范中学建立了党支部,我是支部书记。当时全校有3位党员,其余两位是女同志。支部建立后,开始着手开展学生运动,同时发展党员,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截至抗战胜利,支部共发展了15名党员。当时男、女支部分开,从高三、高二、高一,直到初三,都有了党员。之所以如此,首先与当时的大形势有着密切关系。从1944年秋起,国际形势改观,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,开辟了第二战场;在太平洋战场,美军逐岛攻击日军,反法西斯局势呈现一片光明。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关系还没有破



② 我的兄弟姐妹 从左自右：大哥夏禹思，姊姊夏孟英，二哥夏禹闻和我。

裂,在上海还能看到苏联电影,读到苏联文学书籍。同学们久受日本压制,都想借机搞些活动,出出闷气。其次,与南洋模范中学学生的具体情况有关。南洋模范中学是私立学校,入学门槛高,学生大都家境优越,大部分学生读书用功,态度认真。我认为读书认真的人正派,有爱国心、事业心,有人生追求目标,不会稀里糊涂、虚度光阴。在这样的群众中开展工作,还是比较顺手的。第三个方面的原因,是校内同学间已经有了共产党来自多方面的影响。包括我在内,学校最初的3个党员都是在校外入党的。我从初一到高二,5年里认识了校内很多人,人际关系不错。我做支部书记时才17岁,其实还比较幼稚,能够开展工作,除了联系支部的党的上级领导人的直接帮助外,就是凭借以上所讲的一些因素。

学生运动的实际开展,是从1944年秋开始的。当时我读高二,同学们自发成立了南模团契,隶属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,其实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中也有地下党的力量。团契的活动,主要是发起组织联欢会、郊游、读书会等,比较生活化,很受在日伪长期统治下感到苦闷的同学们的欢迎。1944年底,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“义卖助学”活动,号召同学们向亲友广泛募集



⑤ 南模团契成员集体游览 第二排左二以手托头者是我。

多余的物品，集中起来在青年会进行义卖，所得钱款用于助学。南模团契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。南洋模范中学在“义卖助学”活动中的成绩，在参加的中学里位居第一。由于我们刚开始搞学生运动时，是以基督教做掩护的，其实团契的活动和基督教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随着活动的开展，男女生的界限被打破。“义卖助学”活动结束后，一些积极分子被吸收进入了南模团契。团契不仅跨班级，还打破了男女生的界限，这在南洋模范中学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。原来学校的男生部、女生部之间用篱笆隔开，界限严格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女生部在学校的后部，每天女同学经过时，男生只能从教室窗口遥望。现在界限终于被打破了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，从初二到高二，都有人参加，我们在其中发现积极分子，发展了自己的同志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，配合新四军占领上海，拟定由刘长胜担任市长。南洋模范中学位于市区西南，如果新四军从徐家汇进入，肯定会经过南洋模范中学、交通大学，而当时交通大学已经闭校。学校党组织决定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的行动，于8月22日召开全校庆祝抗战胜利大会。当时学校还在放暑假，党员们挨家挨户向学生们动员。当天来了七八十位学生，党组织的企图已被学校当局察觉，总务主任挡在校门口，阻止学生入内，于是党员带头冲进校园。大会开完了，我们和校方的矛盾也激化起来。其实党中央于8月21日已通电取消了起义计划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情况有变，还是照常举行了大会。学校“秋后算账”，开除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学生。就这样，我在南洋模范中学担任了半年的党支部书记。时间虽然短，但局面已被打开，为以后历届校地下党支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。截至上海解放，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累计共发展135名党员（包括两名工友，没有教师），人数之多，是上海各中学的头块牌子。这是和上海地下党组织重视南洋模范中学的工作分不开的。

我的老师赵宪初

地下党在领导学生运动时，与所在学校校方密切相关。各所学校的历

史背景和政治态度是不同的,有的与统治当局关系密切,有的比较中立,少数倾向于进步,它们是开展学生运动所直接面对的外部条件和环境。怎样处理好与校方既有斗争又需争取的关系,是开展学生运动一个绕不过去、颇为重要的问题。南洋模范中学(以下简称“南模”)地下党处理与校方,特别是与其实权人物教务主任赵宪初的关系,是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。

赵宪初老师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就来南模执教,历时70年,主教数学——小代数和三角,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约有万人。他一生身体力行素质教育,不但培养学生扎实掌握基础知识,而且着重培养学生提高科学思维能力。赵老师爱国正直,生活朴素,清廉自守。他对待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,也从初期为了校方利益而进行一定的扼制,到后期越来越采取同情和庇护的态度。分析起来,这大致有下列3个原因:一是赵老师本人专心致志于办学,希望远离政治,不受政治因素干扰,但实际情况难以做到,有时不得不参与进来;二是地下党员大多功课好,成绩优秀,天然得到他的好感,而那些三青团员,大多功课差,品行也有问题,这就使他在情感上倾向于同情前者;三是全国总的形势是国民党越来越不得人心而有利于革命。正是由于上述原因,再加上党支部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,使他的政治态度逐渐有所转变。

在上海解放以后,赵老师从不愿过问政治到积极参加民主党派,成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民主促进会上海市主任委员。他和地下党员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。早在1981年,他便以个人名义向他认为是地下党员的前学生发信,收集地下党在南模的史料。1983年,他经过综合整理,列出“南模1944—1949年学生运动大事记”的参考提纲,并组织在沪部分地下党同志座谈,收集并弄清史实。赵老师的通知和亲笔信,得到热烈响应,来自全国的60名原地下党员和另外12名同学给他复信,并提供了152件资料。在此基础上,他写成了“南洋模范中学学生运动大事记”。

中学的地下党员流动性很大,南模地下党先后共有7届党支部,谁也说清先后究竟有多少党员。赵老师在征集学运史资料的同时,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、弄清地下党组织情况和共135名地下党员名单。

在这一过程中,赵老师与许多地下党员有过接触,并建立了亲密的关